

生态博物馆是什么？如何建？

□曹兵武

代理”接管。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如内蒙古的敖伦苏木蒙古族生态博物馆加强了社区居民、学者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多方合作，以科研力量指导村民的本土管理，同时加强了社区的文化展示功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如云南西定布朗族生态博物馆，将管理权交到村民手中，实现村民自治的理念。第四代生态博物馆如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呈现多维度发展，范围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西部到东部。

经过 30 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的古村古镇、工业遗址和城市传统社区等，建成 50 座生态博物馆或社区博物馆。已经建成的西部和南部基于少数民族风俗的生态博物馆，承担起保护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蒙古族、汉族等多种文化的任务。随着经济发展 and 生态环境保护与传承等原因，我国生态博物馆也逐渐多样化。

生态博物馆是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博物馆发展新探索，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建设与运营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需要克服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难以满足多方面利益需求的协调性、持续性方面的困难，包括围绕当地民众的发展权利和文化权利等方面的深层问题。因此，我国的生态博物馆探索应在尊重遗产保护利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维护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遗产权益，不打折扣地强化对乡村遗产的系统梳理与科学保护，不断完善价值挖掘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开放兼容的新型遗产展示利用方式，尤其是注重遗产的乡土性及其在脉络化延展与语境化迁移，鼓励创新性利用和创造性发展，突出乡村遗产的活态性特征，以形成以原真性为前提的信息叠加和跨文明形态传播互鉴的优势。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生态博物馆建设应充分体现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二真性——遗产本体原真性和文化信息真实性。在严格的真实性基础上生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知识和价值观体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与生态博物馆必需的协调性与持续性，发挥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对话平台作用，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以及保护落后与满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

博物馆文化本身就是基于传统却面向未来的一种新型文化，它兼顾历史现实与未来，演奏海纳百川的复合型物人关系奏鸣曲。相信生态博物馆可以为乡村遗产保护和利用和乡村振兴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是将数千年积累的优秀乡土文明成果带入未来生态文明的有效手段之一。

生态博物馆源自文博界又不能限于文博界，它既重新发现地方，也扮演对物与人重新进行生态文化启蒙、对人与遗产关系进行重构的重要角色。生态博物馆不仅应该在当前遗产的保护利用及遗产事业深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需要探索更具综合性的遗产理论与方法，尽可能全面地减少遗产面临的自然与人为的破坏性因素，以实现遗产本体的延年益寿和遗产价值的最大化。

由此观之，生态博物馆必须建立在包括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系统的支持与承受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理性的系统性全面认知价值观支撑的良好心态的匹配之下。同时，在打造美丽中国的进程中，更需要维系民族文化传统、保持千百年来的乡土文明，利用地域鲜明的文化推动地域发展，遵循“保护+传承+发展”的原则，因地制宜打造出鲜明特色的民族生态博物馆，让生态博物馆成为传承乡土文明的活标本。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生态博物馆是 20 世纪 70 年代博物馆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它由法国博物馆学家里维埃和戴瓦兰所提出。生态博物馆被提出之后，一直受到国际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关注，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生态博物馆突破了传统博物馆“建筑+藏品+展览+服务”的模式，而是一种以特定区域为单位、以其中整体的且相互关联的自然和人文遗产为对象，将包括当地人及其生产、生活的各种要素进行综合的动态的保护、展示和可持续利用并发展的设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保存、展示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以及人与遗产的活态关系，以形成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自然与人文生态。

应该说，生态博物馆的提出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偶然性是 1970 年 4 月 22 日，美国数千万人走上街头进行大游行，呼吁保护环境，保护地球，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世界地球日。此外，1971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即将在法国格雷诺柏举行，里维埃和戴瓦兰一起商讨，提出将各界普遍关注的生态问题和博物馆的文化问题进行对接，以表明博物馆界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态度，以及博物馆在回应社会发展现实问题中的角色和作用。而必然性则体现在生态博物馆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博物馆界一贯秉持的开放与变革态度，以及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

在我国，生态博物馆理念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通过《中国博物馆》杂志的翻译介绍为国人关注，此后经历了 4 个发展阶段，逐渐在探索中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的发展之路，并在当下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第一代生态博物馆为中挪合作项目资助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以贵州六枝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为代表，遵照生态博物馆对文化遗产整体、动态、当地保护的理念创办，但村民并未“成为主人”，而是在建设初期由政府机构作为“文化

沙尘之患：美国黑风暴事件

□薄 凡

地貌形态和气候因素有关，更与人为的生态环境破坏密不可分，它是荒漠化加剧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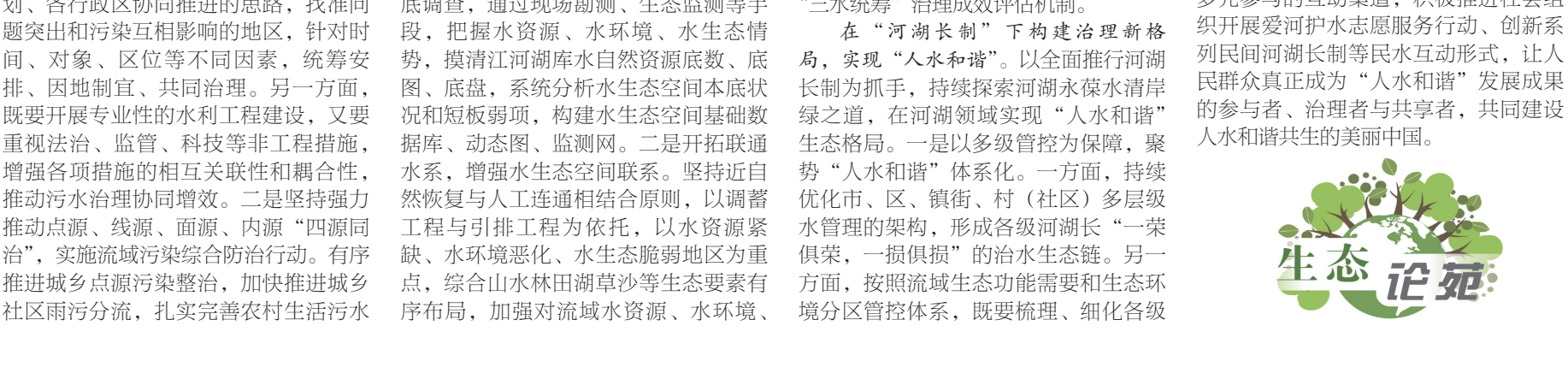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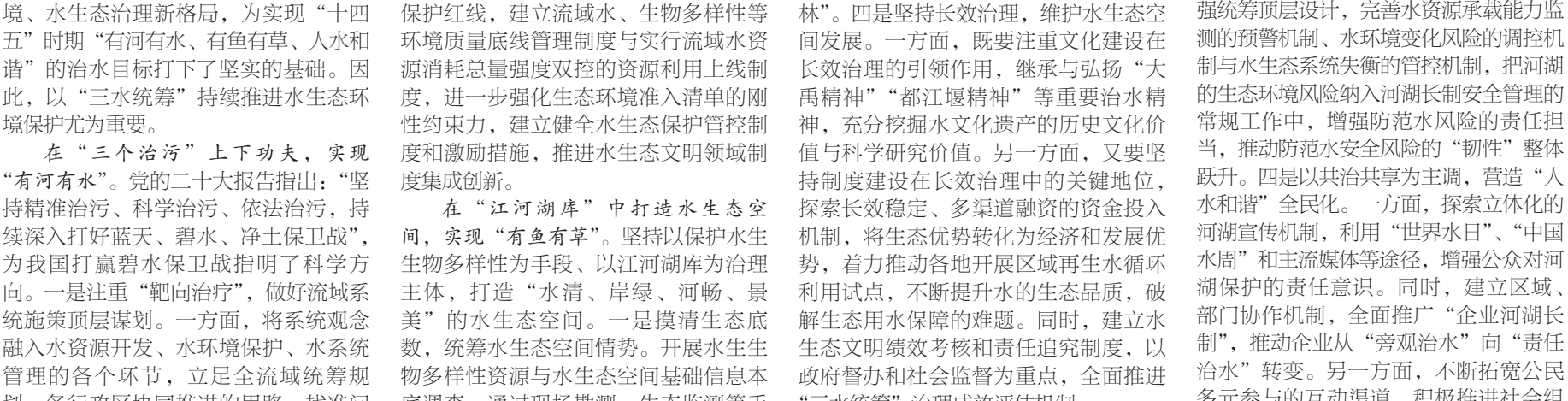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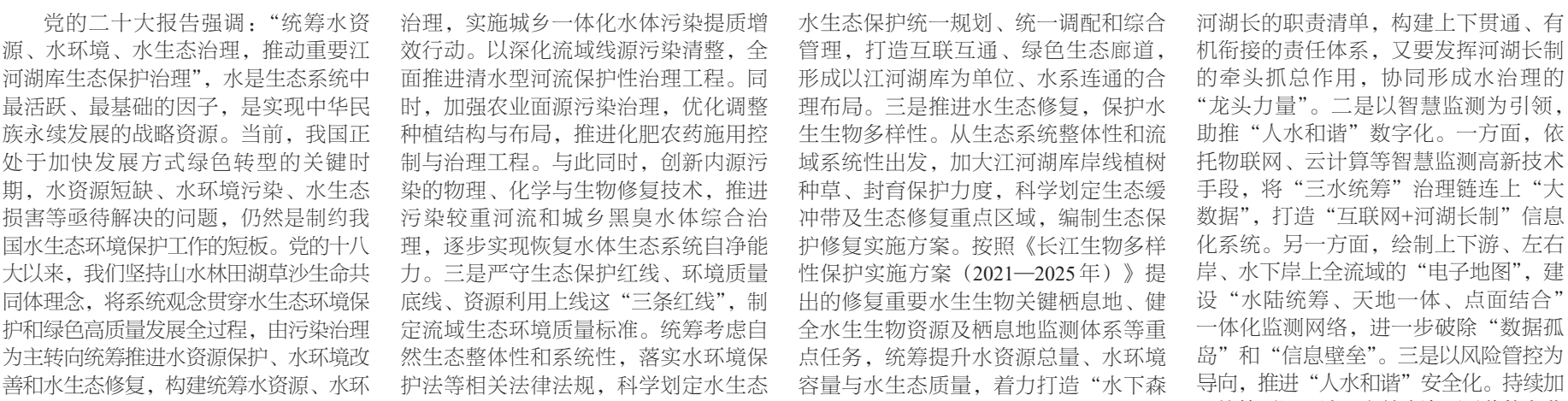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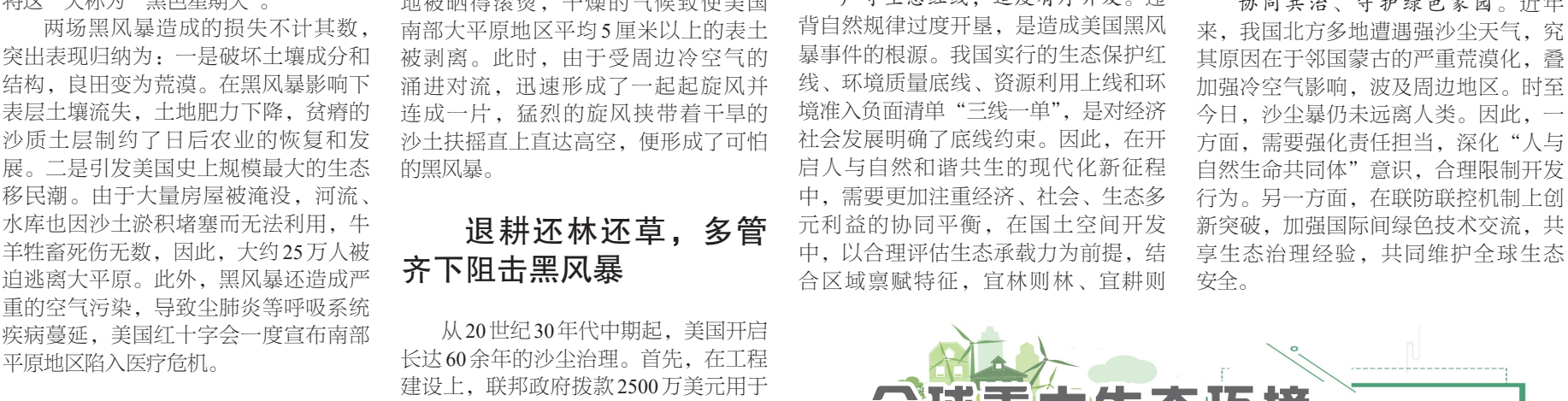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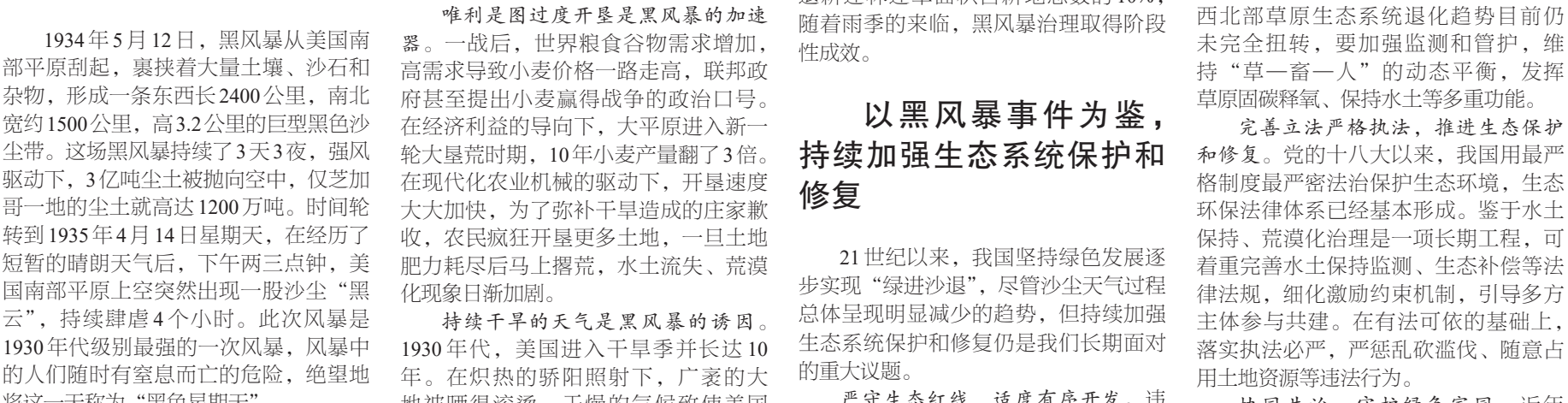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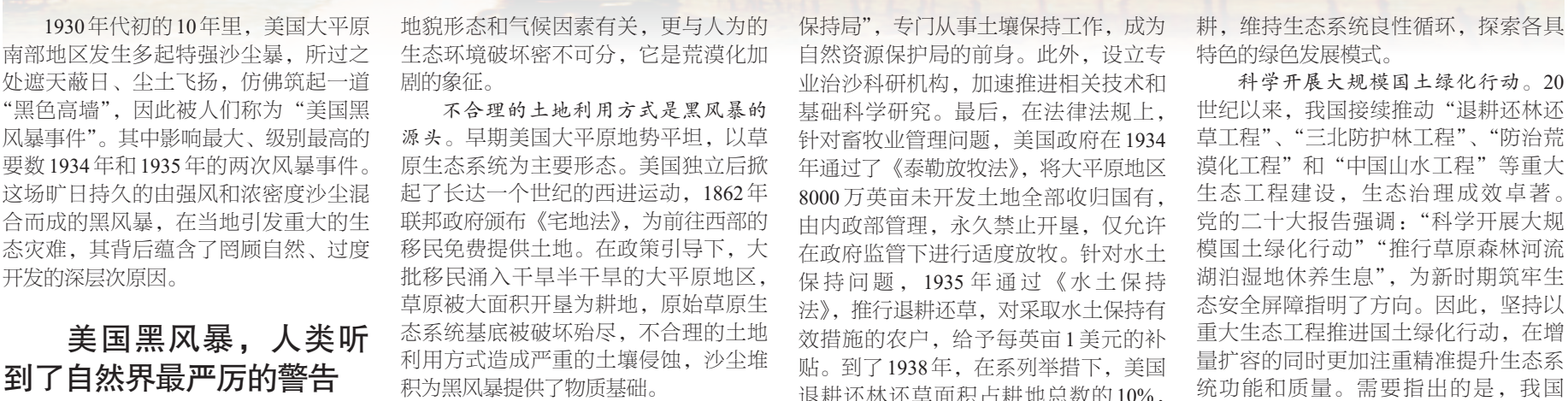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是黑风暴的源头。早期美国大平原地势平坦，以草原生态系统为主要形态。美国独立后掀起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西进运动，1862 年联邦政府颁布《宅地法》，为前往西部的移民免费提供土地。在政策引导下，大批移民涌入干旱半干旱的大平原地区，草原被大面积开垦为耕地，原始草原生态系统基底被破坏殆尽，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造成严重的土壤侵蚀，沙尘堆积为黑风暴提供了物质基础。

唯利是图过度开垦是黑风暴的加速器。一战后，世界粮食食物需求增加，高需求导致小麦价格一路走高，联邦政府甚至提出小麦赢得战争的政治口号。在经济利益的导向下，大平原进入新一轮大垦荒时期，10 年小麦产量翻了 3 倍。在现代化农业机械的驱动下，开垦速度大大加快，为了弥补干旱造成的庄家歉收，农民疯狂开垦更多土地，一旦土地肥力耗尽后马上撂荒，水土流失、荒漠化现象日渐加剧。

持续干旱的天气是黑风暴的诱因。1930 年代，美国进入干旱季并长达 10 年。在炽热的骄阳照射下，广袤的大地被晒得滚烫，干燥的气候致使美国南部大平原地区平均 5 厘米以上的表土被剥离。此时，由于受周边冷空气的涌进对流，迅速形成了一起起旋风并连成一片，猛烈的旋风挟带着干旱的沙尘扶摇直上直达高空，便形成了可怕的黑风暴。

退耕还林还草，多管齐下阻击黑风暴

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起，美国开启长达 60 余年的沙尘治理。首先，在工程建设上，联邦政府拨款 2500 万美元用于防护林工程建设，专门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集结了大批农户进行植树造林、开沟挖渠、修建水库等有偿劳动，防止风暴规模扩张。其次，在组织保障上，1935 年联邦政府授权农业部内设“土壤



保持局”，专门从事土壤保持工作，成为自然资源保护局的前身。此外，设立专业治沙科研机构，加速推进相关技术和基础科学研究。最后，在法律法规上，针对畜牧业管理问题，美国政府在 1934 年通过了《泰勒放牧法》，将大平原地区 8000 万英亩未开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由内政部管理，永久禁止开垦，仅允许在政府监管下进行适度放牧。针对水土保持问题，1935 年通过《水土保持法》，推行退耕还草，对采取水土保持有效措施农户，给予每英亩 1 美元的补贴。到了 1938 年，在系列举措下，美国退耕还林还草面积占耕地总数的 10%，随着雨季的来临，黑风暴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以黑风暴事件为鉴，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21 世纪以来，我国坚持绿色发展逐步实现“绿进沙退”，尽管沙尘天气过程总体呈现明显减少的趋势，但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仍是我们长期面对的重大议题。

严守生态红线，适度有序开发。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垦，是造成美国黑风暴事件的根源。我国实行的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三线一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明确了底线约束。因此，在开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生态多元利益的协同平衡，在国土空间开发中，以合理评估生态承载力为前提，结合区域禀赋特征，宜林则林、宜耕则

以“三水统筹”持续推进水生态环境保护

□ 罗贤宇 林瑜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水是生态系统中最活跃、最基础的因子，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损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将系统观念贯穿水环境保护和绿色高质量发展全过程，由污染治理为主转向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改善和水生态修复，构建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新格局，为实现“十四五”时期“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的治水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以“三水统筹”持续推进水生态环境保护尤为重要。

在“三个治污”上下功夫，实现“有河有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为我国打赢碧水保卫战指明了科学方向。一是注重“靶向治疗”，做好流域系统施策顶层谋划。一方面，将系统观念融入水资源开发、水环境保护、水系统管理的各个环节，立足全流域统筹规划、各行政区协同推进的思路，找准问题突出和污染互相影响的地区，针对时间、对象、区位等不同因素，统筹安排、因地制宜、共同治理。另一方面，既要开展专业性的水利工程建设，又要重视法治、监管、科技等非工程措施，增强各项措施的相互关联性和耦合性，推动污水治理协同增效。二是坚持强力推动点源、线源、面源、内源“四源同治”，实施流域污染综合防治行动。有序推进城乡点源污染整治，加快推进城乡社区雨污分流，扎实完善农村生活污水

水生态保护统一规划、统一调配和综合管理，打造互联互通、绿色生态廊道，形成以江河湖库为单位、水系连通的合理布局。三是推进水生态修复，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加大江河湖库岸线植树种草、封育保护力度，科学划定生态缓冲带及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编制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按照《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提出的修复重要水生生物关键栖息地、健全水生生物资源及栖息地监测体系等重点任务，统筹提升水资源总量、水环境容量与水生态质量，着力打造“水下森林”。四是坚持长效治理，维护水生态空间发展。一方面，既要注重文化建设在长效治理的引领作用，继承与弘扬“大禹精神”“都江堰精神”等重要治水精神，充分挖掘水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科学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制度建设在长效治理中的关键地位，探索长效稳定、多渠道融资的资金投入机制，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和发展优势，着力推动各地开展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不断提升水的生态品质，破解生态用水保障的难题。同时，建立水生态文明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以政府督办和社会监督为重点，全面推进“三水统筹”治理成效评估机制。

在“河湖长制”下构建治理新格局，实现“人水和谐”。以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为抓手，持续探索河湖永保水清岸绿之道，在河湖领域实现“人水和谐”生态格局。一是以多级管控为保障，聚势“人水和谐”体系化。一方面，持续优化市、区、镇街、村（社区）多层级水管理的架构，形成各级河湖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治水生态链。另一方面，按照流域生态功能需要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既要梳理、细化各级

河湖长的职责清单，构建上下贯通、有机衔接的责任体系，又要发挥河湖长制的牵头抓总作用，协同形成水治理的“龙头力量”。二是以智慧监测为引领，助推“人水和谐”数字化。一方面，依托物联网、云计算等智慧监测高新技术手段，将“三水统筹”治理链连上“大数据”，打造“互联网+河湖长制”信息系统。另一方面，绘制上下游、左右岸、水下岸上全流域的“电子地图”，建设“水陆统筹、天地一体、点面结合”一体化监测网络，进一步破除“数据孤岛”和“信息壁垒”。三是以风险管控为导向，推进“人水和谐”安全化。持续加强统筹顶层设计，完善水资源承载力监测的预警机制、水环境变化风险的调控机制与水生态系统失衡的管控机制，把河湖的生态环境风险纳入河湖长制安全管理的常规工作中，增强防范水风险的责任担当，推动防范水安全风险的“韧性”整体跃升。四是以共治共享为主调，营造“人水和谐”全民化。一方面，探索立体化的河湖宣传机制，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和主流媒体等途径，增强公众对河湖保护的责任意识。同时，建立区域、部门协作机制，全面推广“企业河湖长制”，推动企业从“旁观治水”向“责任治水”转变。另一方面，不断拓宽公民多元参与的互动渠道，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开展爱河湖水志愿服务行动、创新系列民间河湖长制等民水互动形式，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人水和谐”发展成果的参与者、治理者与共享者，共同建设人水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